

朱熹論孔門弟子——以《四書章句集注》 徵引為範圍

陳逢源*

〔摘要〕

前人往往留意宋人對聖人形象的揣摩，對孔、顏樂處的追尋，然而朱熹不僅留意於此，更擴及於孔門弟子的分析與檢討，推究過深，固然有偏頗之失，但檢視孔門儒學之傳，分析弟子高下，從道統思惟重新定位《論語》，《論語》不僅是了解孔子言行的典籍，更是檢視孔門儒學之傳的線索，自此形就四書義理體系，《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彼此銜接，聖聖之間，「道統」相傳，儒學有了新的思考方向。為求了解其中轉變之處，筆者檢具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有關孔門弟子的討論，檢討歷來有關「貶抑聖門」的批評，推究朱熹「穎悟」、「篤實」兩分的分類依據，以及儒學「道統」相傳的線索，期以還原朱熹思索之所在。

關鍵詞：經學、儒學、朱熹、四書學、孔門弟子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理學之典範，經學之新標，影響深遠，自不逮言，所謂「集大成而緒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¹承前啟後，開示宏規，深具意義，只是言約意贍，難詳大義，卻也是後人共同的意見，於是補作者有之，攻詰有之，在在牽動學術風潮之變，言人人殊，辨析得失，分判是非，已屬難事，而朱熹本身撰作時反覆改易，前後修訂之處，更關乎朱熹思想建構之進程，隱微之間，後人推究更是困難。所幸晚近學者對於朱熹一生事蹟詳加覈考，不僅釐清以往模糊之處，更可一窺朱熹一生學思奮進不懈，終無停滯的氣魄，²時時改易，正印證朱熹一生有堅持的目標與方向，但卻未必有定執之見的情形，《四書章句集注》自然必須以「動態」方式看待，嘗試了解朱熹思索之進程。

筆者以「毛西河四書學之研究」為題，完成學位論文，追溯根源，上究於朱熹四書學，本是理之當然，所以晚近反覆檢閱《朱子文集》、《朱子語類》，按覈《論孟精義》、《四書或問》，對於朱熹撰作《四書章句集注》，重構經學「典範」，似乎更能了解其中深意所在，草撰〈道統的建構——重論朱熹四書編次〉一文，³嘗試釐清四書編次問題，雖然朱熹題稱方面並不統一，但大抵而言，卻仍有其方向，不論是《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抑或《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乃是具有「進程」與「道統」兩種不同的思惟面向，後人或因篇幅，或依難易，各有取用，⁴遂使朱熹原本用意，隱而不彰。但不論是「進程」，

1 玄燁撰〈朱子全書序〉，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二七冊，頁845。

2 束景南先生先後完成《朱熹佚文輯考》（鹽城：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朱子大傳》（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4月）等一系列之作，參覈比對，考訂既詳，朱熹一生論辯不懈，從大大小小的學術論戰中，思索奮進，集理學之大成，終於有較為清楚的面貌。

3 拙撰〈道統的建構——重論朱熹四書編次〉，《東華中文學報》第三期（2005年5月），頁221-251。

4 按：真德秀《四書集編》、趙順孫《四書纂疏》、胡炳文《四書通》、詹道傳《四書纂箋》、蔡清《四書蒙引》、呂柟《四書因問》等，乃是依《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方式安排，紀昀奉敕纂《四書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鉛印本1971年7月）卷三十五〈四書類〉「《大學章句》一卷《論語集註》十卷《孟子集註》七卷《中庸章句》一卷」提要云：「書肆刊本，以《大學》、《中庸》篇頁無多，併為一冊，遂移《中庸》於《論語》前。」頁721。

抑或「道統」，四書以《大學》為先，則無疑義，《朱子語類》載徐禹所錄：

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易曉，宜先看。《論語》卻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⁵

其他所錄，有稱為「大坯模」、「田契」，有言為「行程曆」、「問架」、「腔子」等，推究其意，不外乎是以《大學》作為四書基礎，主張明確，然而按覈朱熹撰作的歷程，卻是由《論》、《孟》而及於《學》、《庸》，⁶其中轉變，當在於朱熹逐步完成四書義理體系之時，思考已有不同，⁷朱熹〈林擇之八〉一文，似乎可以發覺其中線索，云：

《大學》正經云云，亦以意言耳，《傳》中引「曾子曰」知曾氏門人成之也。

〈林擇之十三〉云：

近看《中庸》，於章句文義間，窺見聖賢述作傳授之意，極有條理，如繩貫碁局之不可亂，因出己意，去取諸家，定為一書，與向來《大學章句》

其中排序，乃是因篇幅大小。至於清末光緒「欽定學堂章程」規定之研習順序，則以《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為序，以切近淺易的內容為先，有關學理精義者為後，強調從日常生活，為人處世中著手，漸次而進。見張百熙撰《欽定學堂章程》（臺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欽定蒙學堂章程」頁8-11。

5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臺北：文津出版社，1986年12月）卷十四「綱領」，頁249。

6 陳鐵凡撰〈四書章句集注考源〉收入錢穆等撰《論孟研究論集》（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2年10月），頁35。

7 按：乾道八年（西元一一七二年）朱熹即與張栻、呂祖謙討論《大學》、《中庸》章句內容，淳熙元年（西元一一七四）完成《大學》、《中庸》章次之分，淳熙四年（西元一一七七年）正式完成《四書章句集注》、《四書或問》，前人誤據〈大學章句序〉、〈中庸章句序〉內容，以為晚至淳熙十六年（西元一一八九年）才完成《四書章句集注》，詳見束景南撰〈四書集注編輯與刊刻新考〉，收入《朱熹佚文輯考》頁619-628。

相似。⁸

可見朱熹思索更及於「聖賢述作傳授之意」，以及經、傳之別，於是《大學》、《中庸》地位更趨重要，依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所考，兩信皆繫於乾道九年（西元一一七三年），正是與張栻、呂祖謙相互切磋討論之後，自此朱熹四書體系已具雛形，此於九月完成的〈中庸集解序〉，宣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宗傳線索，以及北宋周、程獨得其傳的說法，⁹正可相互證明，自此朱熹慨然承擔「道統」之傳，逐步完成儒學經典重構，更具學術氣魄。

了解於此，四書之中，朱熹撰〈大學章句序〉、〈中庸章句序〉，一抒學術宗旨，而《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卻僅有抄撮諸家說法的〈序說〉，意義也就不難推知，有趣的是，朱熹於《論孟精義》卷首列「孔孟氣象」，提供後人風慕效法，然《論語集注》中卻刪去此段，遍檢《朱子文集》，僅有一段文字透露一點訊息，云：

或問：「程子通論聖賢氣象之別者數條，子既著之《精義》之首，而不列於《集注》之端，何也？」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造道之深，知德之至，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學之士所得驟而語也。鄉吾著之書首，所以尊聖賢，今不列於篇端，所以嚴科級，亦各有當爾。且吾於程子之論讀是二書之法，則既掇其要而表之於前矣，學者誠能深考而用力焉，盡此二書，然後乃可與議於彼耳。¹⁰

揣摩「聖人氣象」本是宋代理學的核心課題，朱熹卻於《論語集注》略去，改列程氏讀書之法，所謂「嚴科級」，當可了解朱熹對於《論語》的定位，觀點已有不同，《論語》既非上究聖人唯一門徑，聖人氣象應有更為宏觀的視野以及明確的方向，所以《論語》代表的是孔門弟子輯錄的成果，而非孔子的直接之作，在

8 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年2月）第十冊〈別集〉卷六，頁5223、5226-5227。

9 同注8，第八冊，卷七十五〈中庸集解序〉，頁3791-3792。

10 同注8，第八冊，卷七十四「雜著」〈讀書之要〉，頁3726。

「道統」之傳的位置，自然也就讓位於《大學》。事實上，如果以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架構而言，《大學》屬於曾子，而《論語》屬於孔子，其間順序不免顛倒，不過如果進一步分析，朱熹認為《大學》乃是孔氏遺書，而《論語》卻是後學綴輯孔子言論而成，所以由《大學》而入《論語》，反而符合孔子、曾子的傳授脈絡，無怪乎《大學章句》篇首引程氏之言云：「《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分經別傳之餘，朱熹甚至云：「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¹¹而《論語集注·序說》引程氏之言云：「《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於二子以子稱。」¹²甚至注解《論語》時，往往推尋弟子門人的撰作情形，¹³皆可一窺朱熹安排之處，朱熹〈答韓無咎〉一文更直揭：「如《論語》之書，亦是七十子之門人纂錄成書」，¹⁴所以《大學》分量雖少，卻是孔子遺教；《論語》分量雖多，乃是雜出於門人弟子眾人之手，輕重之間，也就清楚明白。所以唯有更加留意研讀方法，方能上究於聖人，而反映在匯輯諸家注解上，似乎也就必須更加留意孔門弟子高下的評騭，以及孔子以下儒學傳授的樣貌，此為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頗為特殊之處，也是了解朱熹建構儒學之重要關鍵。¹⁵

二、「貶抑聖門」辨

事實上，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對於孔門弟子過分的論究，前人早已有所發覺，毛奇齡撰《四書改錯》，即列「貶抑聖門錯」一門，列舉四十七條，針對於朱熹注解偏頗之處，提出批判，¹⁶其中部分針對孔子言論，或是心性觀點分歧的

11 朱熹撰《大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年2月），頁3-4。

12 朱熹撰《論語集注·序說》。同注11，頁43。

13 朱熹撰《論語集注》常引胡寅推斷篇章撰作情形，如《論語·里仁篇》云：「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頁74。〈公冶長〉云：「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頁75。〈先進篇〉云：「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頁123。〈憲問篇〉云：「此篇疑原憲所記。」頁148。用意並非在於注解而已，更在於說明《論語》的撰作屬性。

14 同注8，第四冊，卷三十七「書」〈答韓無咎〉，頁1500。

15 學妹吳曉昀協助輯出朱注內容，提供討論之材料，謹以致謝。

16 毛奇齡撰 張文彬等輯《四書改錯》（嘉慶十六年學圃重刊本）卷二十，頁1-22。及卷二十

討論，但絕大多數則是針對朱熹有意無意之間，對於孔子弟子過度批評的檢討，或是過度引伸，曲解經旨；或是引據其他材料，訴諸刻板印象；甚至並無其他佐證，也往往直接論斷弟子有所缺失，毛奇齡分析其原因，乃是「註者必曰對病發藥，聖門無完行矣」，認為此乃「聖門冤獄」。¹⁷雖然毛氏之論，常有嚴苛之處，但檢覈其內容，確實切中《四書章句集注》非常特殊的詮釋模式，朱熹引據前賢之見，以評論方式來詮釋經旨，尤其常以「有罪推定」的方式來檢覈孔子弟子言行，既關乎宋代諸儒講論的習氣，也涉及朱熹注《四書章句集注》潛藏的思惟，分析《四書章句集注》列舉孔子弟子三十一人中，¹⁸除基本姓氏注解，相關事蹟說明之外，其他關乎詮釋部分，往往有其預設立場，尤其更及於批評者，撮舉其要：

（一）對弟子說法的貶抑

- ◎引謝氏曰：「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述而篇》）
- ◎朱注：「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顏淵篇》）
- ◎朱注：「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子路篇》）
- ◎引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辭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學而篇》）
- ◎引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惟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顏淵篇》）

一，頁 1-18。

17 同注 16，卷二十一，頁 7-8。

18 統計朱熹注解孔門弟子，包括顏淵、閔子騫、冉伯牛、冉雍、冉求、子路、宰我、子貢、子游、子夏、子張、曾子、澹臺滅明、宓子賤、原憲、公冶長、南宮适、曾點、顏路、高柴、漆雕開、司馬耕、樊遲、有子、公西華、巫馬施、申枨、琴牢、陳亢、孟懿子、孺悲等，共三十一位。朱熹對於孔門弟子不僅是生平的引介，或是針對經旨的闡發而已，對於其中學養高下，更是多所留意。

◎朱注：「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病。」（《子張篇》）

（二）對弟子言行的批評

◎引范氏曰：「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先進篇》）

◎引胡氏曰：「……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雍也篇》）

◎朱注：「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子罕篇》）

◎引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子罕篇》）

◎引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子罕篇》）

◎引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孟子·離婁下》）

◎引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為政篇》）

◎朱注：「（子張）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先進篇》）

◎朱注：「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子張篇》）

◎朱注：「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顏淵篇》）

◎引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顏淵篇》）

◎引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顏淵篇》）

◎朱注：「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顏淵篇》）

（三）對弟子仕宦的褒貶

◎引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雍也篇》）

◎引謝氏曰：「……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

- 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雍也篇〉）
- ◎引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先進篇〉）
- ◎引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顏淵篇〉）
- ◎引胡氏曰：「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子路篇〉）
- ◎引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憲問篇〉）
- ◎朱注：「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為政篇〉）
- ◎引程子曰：「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子張篇〉）
- ◎引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況其下者乎？」（〈泰伯篇〉）
- ◎引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顏淵篇〉）
- ◎引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子路篇〉）
- ◎朱注：「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憲問篇〉）
- ◎引程子曰：「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先進篇〉）
- ◎引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公冶長篇〉）

（四）對質性不佳的推斷

- ◎引程子曰：「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

- 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為政篇〉）
- ◎引程子曰：「孔子之道……若顏子則便默識，其它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陽貨篇〉）
- ◎引程子曰：「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公冶長篇〉）
- ◎引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先進篇〉）
- ◎朱注：「《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先進篇〉）
- ◎引張敬夫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再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先進篇〉）
- ◎引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子路篇〉）
- ◎引胡氏曰：「切切，懇到也。惇惇，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子路篇〉）
- ◎引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公冶長篇〉）
- ◎朱注：「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雍也篇〉）
- ◎引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雍也篇〉）
- ◎朱注：「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憲問篇〉）
- ◎引謝氏曰：「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雍也篇〉）
- ◎朱注：「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先進篇〉）
- ◎聞之師曰：「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公冶長篇〉）
- ◎朱注：「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先進篇〉）
- ◎引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顏淵篇〉）

- ◎朱注：「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顏淵篇〉）
- ◎引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顏淵篇〉）
- ◎引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論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衛靈公篇〉）
- ◎朱注：「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陽貨篇〉）
- ◎引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陽貨篇〉）
- ◎引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張篇〉）
- ◎朱注：「樊遲驕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顏淵篇〉）
- ◎引楊氏曰：「樊須游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辟之可也。」（〈子路篇〉）

（五）未明理由的批判

- ◎朱注：「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顏淵篇〉）
- ◎朱注：「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雍也篇〉）（※分類之中，依弟子為次）

以上所列，未敢言其周詳，但已可略見朱熹的詮釋方向，當然從引錄的情況，其中多數屬於前賢意見，但朱熹以「述」代「作」，前賢之見，個人體會，早已融鑄一體，自然無法截然分別。¹⁹ 檢討其中，固然有延伸闡釋經旨之處，《論語》之中，原本就有孔子檢討弟子言行，改正缺失的言論；弟子之間，也有相互切磋，彼此期勉以德的情況，推究孔門之間，以道相尚，原為平常之事，朱熹留意其中，固然十分可貴，但無可諱言，《論語》之中也有申明普世價值，提供共同準則的情形，一概視為「發其病而藥之」，難免有超乎詮釋分際的批評，以朱熹深究孔

19 參見筆者與黃瀚儀合撰〈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徵引書目輯考〉，《政大中文學報》第3期（2005年6月），頁176-178。

門弟子德行，一方面可能出於宋儒講論習氣；另一方面，也是朱熹有意無意之間，特意彰顯的結果，所以在《四書章句集注》中，冉求「心術不明」、「逡巡畏縮」，子路「行詐欺天」、「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子貢「徒事高遠」、「以貨殖為心」、子夏「規模狹隘」、「病常在近小」、子張「少誠實」、「不務實」、「無誠心愛民」、「外有餘而內不足」、「過高而未仁」、司馬耕「多言而躁」、樊遲「驕鄙近利」、「志則陋矣」等，批判性的字眼，加強了後人對孔子弟子不佳的刻板印象。分析其中，對於弟子仕宦的質疑，或許來自儒家一貫以民為本的重德主張，難免要求較多，對於個人出仕進退之際，有更高的期許，所以對於不仕於大夫之家者，如閔子、曾子等人，深致詠嘆，至於子路、冉求仕於季氏，則是多所批評，而子張學干祿，更是成為批判的對象。而對於弟子言行之間，以及質性的檢討，則是出於區隔孔子與弟子應有高下之分的原則，以及弟子之間相互比較的結果，所以其中的詮釋一偏，自然也就有以批判取代說明的情況，以子夏曰：「賢賢易色」一章，朱熹引吳氏曰：「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學而篇〉）其分別之意，十分清楚，凸顯孔子學術之崇高，原即為詮釋者努力的方向，也是注家之本分，朱熹於此自多所著力，本無可厚非，但必須勉力於弟子言論中，尋求不及孔子之處，則不免流苛細。再者，針對孔子對於弟子的提示，同樣也必須留意孔子「因材施教」的觀點，於是凡其所言皆為弟子缺失，例如引范氏曰：「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陽貨篇〉），針對子路過於剛直的調整，詮釋尚不失分際；但如果詮釋一偏，過執「發其病而藥之」的觀點，一切以因其失而告之的角度來思索，不免令人深感不安，以子張問仁，孔子言「恭、寬、信、敏、惠」一章（〈陽貨篇〉）為例，朱熹注：「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其實五者之目，孰可言足，孔子申明仁者之宏大，原非人人可及，但朱熹的注解，讓人以為子張質性不佳，以《韓非子·顯學篇》「儒分為八」之目，子張列居其首，²⁰傳續儒學，未可言其無功，但於朱熹詮釋之中，卻是多所貶抑，此或許出於宋人對於孔子之後儒學傳續的揀擇過程，不過此一詮釋脈絡，卻使孔子弟子德行成為討論的議題，此或可溯自王充《論衡·問孔篇》

20 王先慎撰《韓非子集解》（臺北：世界書局新編《諸子集成》本，1983年4月）卷十九〈顯學篇〉，頁351。

對於「孔門之徒，七十子之才，勝今之儒」這個命題的質疑，²¹王充乃是強調古今智慧無異，但宋人似乎將此推之更過，於是孔子弟子之中，子路勇而無禮，宰我昏惰，子張不務實，樊遲志陋粗鄙，形成後人難以更革的刻板印象，不同於王充時代「七十子之才，勝今之儒」的觀點，宋人認為孔子仁德為聖，群弟子卻是仁德有缺，儒學傳衍有一個空缺的發展，此為經典詮釋的問題，卻也形成宋人形塑孔子聖人形象之餘，一個少人注意，卻又十分特殊的儒學現象，或許出於「因材施教」的過度推衍，但對於孔子之後的儒學發展，有一個全新的觀察，卻也於此得見。

三、孔門二系與「道統」之傳

朱熹的詮釋脈絡，似乎除了過執「藥病」的觀點之外，朱熹詮釋孔弟子之中，尚有十分特殊之處，注解的出現固然配合經文本身出現的頻率，次數或許不足以代表詮釋的偏重，但以輯出之內容而言，顏淵於弟子之中，確實最為特殊，不僅分量最豐，詮釋的面相亦最多，除生平事例之說解外，相關之討論，列舉如下：

（一）彰顯孔子的指引

- ◎朱注：「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子罕篇〉）
- ◎引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子罕篇〉）
- ◎引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子罕篇〉）
- ◎引范氏曰：「……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子罕篇〉）
- ◎朱注：「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而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先進篇〉）
- ◎引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先進篇〉）

21 王充撰《論衡》（臺北：世界書局新編《諸子集成》本，1983年4月）〈問孔篇〉，頁86。

◎朱注：「蓋取其時之正與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衛靈公篇》）

◎引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衛靈公篇》）

（二）與孔子德行相較

◎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為政篇》）

◎引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公冶長篇》）

◎引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雍也篇》）

◎引尹氏曰：「……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述而篇》）

◎引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述而篇》）

◎引楊氏曰：「……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子罕篇》）

◎引尹氏曰：「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衛靈公篇》）

◎引張子曰：「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孟子·盡心下》）

（三）與其他弟子相比

◎朱注：「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公冶

長篇))

◎朱注：「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泰伯篇》)

◎引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群弟子所不及也。」(《子罕篇》)

◎朱注：「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顏淵篇》)

◎朱注：「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季氏篇》)

◎引程子曰：「孔子之道……若顏子則便默識，其它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陽貨篇》)

(四) 對於德性的稱揚

◎朱注：「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雍也篇》)

◎引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雍也篇》)

◎引程子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雍也篇》)

◎朱注：「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雍也篇》)

◎引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雍也篇》)

◎朱注：「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子罕篇》)

◎朱注：「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先進篇》)

◎引胡氏曰：「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先進篇》)

◎朱注：「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顏淵篇》)

- ◎朱注：「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也。」（《顏淵篇》）
- ◎朱注：「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衛靈公篇》）
- ◎朱注：「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季氏篇》）
- ◎朱注：「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孟子·離婁下》）
- ◎朱注：「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中庸》）

（五）對於工夫的表彰

- ◎引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道也。」（《雍也篇》）
- ◎引程子曰：「……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雍也篇》）
- ◎朱注：「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子罕篇》）
- ◎引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於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顏淵篇》）
- ◎朱注：「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顏淵篇》）
- ◎引楊氏曰：「……顏子居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孟子·盡心上》）
- ◎朱注：「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中庸》）

孔子於顏淵，情誼既深，顏淵之德，不僅出於孔子本身的稱揚，也見諸孔門

同儕之間的推崇，此皆見於《論語》之中，後人自無可疑，甚至先秦諸子，也隱約可見顏淵傳續孔子之道的印象，²²不過宋儒對此似乎更加發揚，分析其中，闡發孔子的指引，乃是藉以申明師生情誼以及孔門以道相尚之精神，表彰孔子與顏淵關係，師生傳授之間，成就典型，既是學問相投，更是生命的相互契合，宋儒並且以孔子與顏淵學行相比，顏淵「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與孔子是「未達一間者」，至於與門人相較，則是「群弟子所不及也」，顏淵於孔門之地位，於此可見，宋儒甚至更直接推斷「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師生情誼深厚至此，此一立場，朱熹亦落實於詮釋之中，凡是孔子對顏淵的指引，朱熹一反「藥病」觀點，以問政仕宦而言，對於冉求、子路，是不假辭色，多所批評；對於子張更是言其「未仁」，然而顏淵問「為邦」，朱注：「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²³詮釋之偏頗，至為明顯，顏淵既無事功，朱熹甚至以比喻方式，云：「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²⁴顏淵未能行道於天下，但反而留下宋儒諸多的想像，而「王佐之才」的評價，更可見宋儒對於顏淵的偏愛。相同的情形，以弟子們問仁，顏淵問仁，朱熹認為孔子所授是「心法切要之言」，而非顏淵於禮有虧。仲弓問仁，朱熹認為「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司馬牛問仁，朱熹更是認為「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至於「雍也仁而不佞」一章，朱熹更以顏淵作為標準，云：

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

22 朱熹撰《孟子集注》卷三〈公孫丑上〉載「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同注 11，頁 233-234。郭象注 郭慶藩集釋《莊子集釋》（臺北：世界書局新編《諸子集成》本，1983 年 4 月）〈人間世〉載孔子傳顏淵「心齋」，頁 67-68。〈大宗師〉云：「顏回曰：『隋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頁 128-129。不論是故意顛倒孔子與顏淵傳道關係，或是直接訴求孔子傳道線索，心齋、坐忘，皆屬道家關鍵工夫，莊子援取孔子與顏淵的應對情境，應是有取儒家傳道事例，對等比喻，由此可見，而孔子傳道顏淵，已是寓言援取運用之典故。

23 朱熹撰《論語集注》卷八〈衛靈公篇〉。同注 11，頁 163。

24 朱熹撰《孟子集注》卷八〈離婁下〉。同注 11，頁 299。

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²⁵

於是同樣是有關仁德的釐清，孔子也同樣施以指引，但朱熹認為彼此高下有別。朱熹不僅分別其中，特意凸顯顏淵得傳之正外，甚至以「心法」之稱，引錄程子「視、聽、言、動」四箴，反覆致其詠嘆，叮嚀學者深思玩味，其偏愛之情於此可見。朱熹固然以「因材施教」作為詮釋分別的基礎，只是分之過細，說法不同，高下之間，不免也讓人無法揣摩孔子的究竟之義，朱熹似乎也發覺此一詮釋困境，所以後文亦稍作回護，云：

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²⁶

所以孔子之言雖有差別，但同是切身之學，入德之要，朱熹不僅完成顏淵得傳的學術脈絡，也維護孔子言論的嚴正與純粹。事實上，朱熹對於顏淵學術的著力，固然出於《論語》文本的啟發，更是北宋以來諸儒的共同關懷，朱熹引錄諸子言論，即透露此一訊息，如引程子之言，云：

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²⁷

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²⁸

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²⁹

所謂「氣象」也者，《論語·先進篇》曾點一章，最可玩味，然而對於詮釋者而

25 朱熹撰 《論語集注》卷三〈公冶長篇〉。同注 11，頁 76。

26 朱熹撰 《論語集注》卷六〈顏淵篇〉。同注 11，頁 133。

27 朱熹撰 《論語集注》卷三〈公冶長篇〉。同注 11，頁 83。

28 朱熹撰 《論語集注》卷三〈雍也篇〉。同注 11，頁 87。

29 朱熹撰 《論語集注》卷三〈雍也篇〉。同注 11，頁 84。

言，「氣象」提供更多的詮釋與想像空間，仲尼與顏子樂處，更是一種儒學情懷與內涵的體會，無關乎富貴利祿的享樂，甚至是得君行道的成就，學道有其純粹的快樂，於此不僅符合宋儒艱困成學的普遍經驗，也鼓舞困頓之中對道的堅持，兩者相互影響，其意義深鉅，也更印證北宋儒學之傳的線索，以及道學成立的契機。³⁰或許朱熹執著「藥病」的觀點，以檢視孔門弟子，乃是為求釐清弟子之高下，目的更在於凸顯顏淵之學術地位。

只是顏淵短命而死，事功未顯，學行之間，仍有賴宋儒的諸多想像，所謂「深潛純粹」、「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王佐之才」，德行才學深厚至此，甚至直言「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於此可見宋儒對於顏淵之褒揚。事實上，朱熹對於孔門弟子的學行，也進行進一步的梳理，云：

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³¹

質性不同，孔門弟子，「穎悟」與「篤實」兩分，朱熹並且據以說明〈子張篇〉中多記子夏、子貢之言，乃是反映孔門弟子的發展情形，此為孔門分系問題，關乎先秦儒學脈絡的釐清，實非本文所能深究，不過以詮釋而言，朱熹的論斷並非

30 按：黃宗羲撰 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年9月）卷十一〈濂溪學案上〉載全氏按語云：「濂溪之門，二程子少嘗遊焉。其後伊洛所得，實不由于濂溪，是在高弟滎陽呂公已明言之，其孫紫微又申言之，汪玉山亦云然。今觀二程子終身不甚推濂溪，並未得與馬、邵之列，可以見二呂之言不誣也。晦翁、南軒始確然以為二程子所自出，自是後世宗之，而疑者亦踵相接焉。」頁480。關乎北宋儒學之傳，歷來爭議多矣，周敦頤是否得列儒傳道之列，乃是對於濂溪之學是否純粹的學術判斷。不過以《四書章句集注》引程子言：「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則朱熹、張栻援取周敦頤為北宋始得道統的說法，未為無據。朱熹撰〈中庸集解序〉云：「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于天下。」見《朱子文集》第八冊，卷七十五〈中庸集解序〉，頁3792。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6月）卷四百二十七〈道學傳〉首列周敦頤，亦云：「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頁12712。〈道學傳〉載程頤遊太學，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頁12718。可見此一思索進程，乃是北宋儒者的共同議題，所謂「道學」也者，並非僅是儒學命義的釐清，更在於「聖人氣象」的揣摩，以及對於接續聖人之道的熱切情懷。

31 朱熹撰《論語集注》卷十〈子張篇〉。同注11，頁188。

出於揣測，《論語·衛靈公》「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一章，朱熹引尹氏，云：

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論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³²

同樣言及「一以貫之」，宋儒似乎更留心其中辭氣的不同，〈里仁篇〉孔子對於曾子是直接陳述學術旨趣，曾子不僅心領神會，更據以回答門人「忠恕而已矣」的體會，兩則皆關乎孔子一生學術的陳述，但對於曾子與子貢，說明方式並不相同，其中細節，千載之下，固然難以了解，但宋儒卻據以分別兩人學術高下，曾子成為孔門「篤實」一系重要弟子，剔除生平事例之說解，朱熹對於曾子學術德行，自然多所留意，撮舉其要：

- ◎朱注：「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學而篇〉）
- ◎引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學而篇〉）
- ◎引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學而篇〉）
- ◎朱注：「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里仁篇〉）
- ◎朱注：「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里仁篇〉）
- ◎引程子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

32 朱熹撰《論語集注》卷十五〈衛靈公篇〉。同注 11，頁 161-162。

- 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里仁篇》)
- ◎引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雍也篇》)
- ◎朱注：「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者不能也，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述而篇》)
- ◎引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泰伯篇》)
- ◎朱注：「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曾子以其所保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泰伯篇》)
- ◎引程子曰：「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泰伯篇》)
- ◎引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泰伯篇》)
- ◎引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泰伯篇》)
- ◎引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論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衛靈公篇》)
- ◎引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先進篇》)
- ◎引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先進篇》)
- ◎引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先進篇》)
- ◎朱注：「真知善惡而成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季氏篇》)
- ◎朱注：「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子張篇》)
- ◎朱注：「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公孫丑上》)
- ◎朱注：「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孟子·離婁上》)

◎引程子曰：「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孟子·離婁上》）

以內容而論，分量或許不及於顏淵，但對於曾子詮釋上的偏愛，則無不同，《論語·先進篇》「參也魯」一句，實非讚美之辭，但是朱熹引據卻是多所迴護，所謂「以魯得之」、「誠篤而已」、「才魯，故其學也確」，後文既言為「性之偏」，但朱熹詮釋「魯」不僅採正面表述，甚至認為是曾子得以超越其他弟子的勝出條件，「魯」之為誠，乃是衍釋性的說法，朱熹不採「藥病」之說，詮釋之偏，顯然可見，原因同樣也在於形塑孔門中曾子的學術地位，不過不同於宋儒特意彰顯顏淵學行，建構顏淵與孔子以及與其他弟子的對應關係，朱熹更加留意曾子可以得孔子之傳的線索，「傳」之一字，成為詮釋的核心，因此屢屢言及「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孔子教誨弟子，原本就是期以有所得而告之，但宋儒以「將有所得」、「能達此」來加強曾子得傳孔子學術的印象，而曾子回答門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一節，更凸顯成為曾子傳孔子學術的證明。因此，有關曾子學術的闡述，自然也多所著力，曾子孝親，宋儒認為「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而「啟予足！啟予手」，曾子對於受之父母身體的看重，固然有其一生的堅持，但宋儒言其「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褒揚至極。至於「三省吾身」的工夫，朱熹更是言其「為學之本」，引謝氏曰：「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而於《孟子》更揭示曾子「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儒學多門，但孔子傳道的內容，宋儒卻似乎有了新的線索，甚至以往孔門四科之說，朱熹亦引程子之言，認為「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四科十哲」實出於《論語》，宋儒對此之揚棄，正可見對於曾子之重視。有趣的是所引謝氏之言「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似乎正是朱熹於四書之中，努力建構之處，《論語·述而篇》「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一章，朱熹引程子之言，以為是曾子之言；³³《論語·泰伯篇》「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朱熹引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³⁴於《論語》

33 朱熹撰《論語集注》卷四〈述而篇〉。同注 11，頁 102。

34 朱熹撰《論語集注》卷四〈泰伯篇〉。同注 11，頁 103。

疑似之處，發掘曾子的「嘉言善行」，甚至以《禮記·大學》一篇，朱熹分為經一、傳十，所謂之經，是「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所謂之傳，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³⁵經、傳之分，乃是援取自漢以來的經學體例，其實並無太多依據，日後學者此移彼易，爭執不休，³⁶更關乎時代學風的改易，³⁷追根究柢，實出於朱熹分別經、傳之舉，推究其原因，朱熹固然有意梳理《大學》的義理脈絡，但更重要的是賦予曾子傳道之地位，補足孔子傳道的環節，曾子成為孔子道統傳諸子思、孟子的關鍵，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一系相承，儒學有相傳的線索，而《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朱熹稱之為「四子」，³⁸而四書正是「道統」的證明。³⁹宋儒重構儒學之傳，完成孔門二系的建構，顏淵與曾子兩分，儒學從「篤實」而出，原本孔、顏之樂的追求，進一步落實於孔子傳道的思索，聖人氣象有更為具體的內容，孔門弟子學行不僅提供朱熹思考儒學內容的線索，更提示「道統」有傳的歷史情懷，其意義恐非疏解大義，說明經旨而已。

四、「道統」思惟與《論語》的定位

北宋諸儒的思索，建構孔門之傳的線索，反映於朱熹「道統」思想之中，也

35 朱熹撰《大學章句》。同注 11，頁 4。

36 事詳見李紀祥撰《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 年 8 月）附表「從朱子經傳之分表」、「反對朱子經傳之分表」，頁 331-339。

37 清代乾嘉學者標舉漢學，戴震以十歲之齡，就曾質疑朱子《大學》經「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的說法，朱熹去孔子幾二千年，文獻無徵，朱熹從何得知。見洪榜〈戴先生行狀〉、王昶〈戴東原先生墓志銘〉所載，張岱年主編《戴震全書》（合肥：黃山書社，1995 年 10 月）第七冊「附錄」頁 4 及 30。

38 按：「四子」之說，見於淳熙十三年（西元一一八六年）朱熹〈答楊子直二〉云：「且如今書『四子』之說，極荷見教。然此書之目，只是一時偶見，《大學》太薄，裝不成冊，難作標題。故如此寫，亦欲見得《四書》次第，免被後人移易顛倒。只如《大學》，據程先生說，乃是孔氏遺書，而謂其他莫如《論》、《孟》，則其尊之，固在《論語》之右，非熹之私說矣。」同注 8，第五冊，卷四十五「書」〈答楊子直二〉，頁 2011-2012。雖然楊方（字子直）有所不滿，朱熹自稱僅是「一時偶見」，但「四子」之說，呼應「道統」之傳的線索，與《大學》置於《論語》之前的觀點，似乎已經形成。

39 朱熹於光宗紹熙元年（西元一一九〇年）改知漳州，刊行《書》、《詩》、《易》、《春秋》四經，以及《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四子，並撰〈書臨漳所刊四經後〉、〈書臨漳所刊四子後〉。同注 8，第八冊，卷八十二〈書臨漳所刊四經後〉、〈書臨漳所刊四子後〉。頁 4069-4073、4078-4079。

成為詮釋四書的關鍵，此於〈大學章句序〉申明其旨，云：

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⁴⁰

能夠接續孟子之傳，也就成為儒者無可逃避的歷史使命，朱熹以二程接續其傳，日後更上溯周敦頤的啟發，「道統」終能復現，北宋以來的儒學反省，終能獲得歷史的定位，朱熹以獨得其祕的體會，完成此一學術建構，所謂「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大學》乃是曾子「作為傳義，以發其意」，曾子關乎四書體系成立之關鍵，而孔學有傳，也就更為清楚明確，朱熹並且於〈中庸章句序〉申明其旨，云：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⁴¹

自此，朱熹「道統」理論建構完成，天理性命之所在，聖賢授受的線索，更為詳實細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傳道之序，已經確立，孔子傳續道統的說法，朱熹並且補入顏氏雖及見孔子之道，卻未能有傳，而以曾子獨膺傳道重任，儒學

40 朱熹撰 〈大學章句序〉。同注 11，頁 1-2。

41 朱熹撰 〈中庸章句序〉。同注 11，頁 14-15。

架構也就落實於《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中，朱熹於六十歲之齡，撰成兩篇序文，相距不過一月，卻是代表一生思索四書義理之心得，由於妙契千古以來聖賢相傳的線索，也就無怪乎隔年於臨漳刊刻四經、四子，四經包括《書》、《詩》、《易》、《春秋》；《書》、《詩》以本文為經，置諸序於後，《易》用呂祖謙所定《周易經傳》，《春秋》以《左氏》經文，朱熹分別經傳，以呈現古經原本，用意無非是廓除漢人的附會之言，恢復孔子所傳原貌。⁴²至於「四子」也者，〈書臨漳所刊四子後〉云：

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且考舊聞，為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⁴³

同樣是以經文為主，⁴⁴朱熹強調刊刻用意在於恢復原本，一方面落實二程先四書而及六經的成學順序，另一方面則使學子擺脫自漢以下的分歧之見，直接上究聖人經典，自此一改漢儒尊師法家法的經學傳統，開啟宋學直究聖人的學術主軸，新的經學「典範」確立成熟，其意義之重大，也就無怪乎朱熹會慎重其事撰〈刊四經成告先聖文〉以昭告先聖先賢，宣示其一生的學術心得。⁴⁵「四子」既是指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然而所列卻是《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序，文中既強調「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可見其序並非

42 同注 8，第八冊，卷八十二〈書臨漳所刊四經後〉，頁 4069-4073。

43 同注 8，第八冊，卷八十二〈書臨漳所刊四子後〉，頁 4079。

44 按：朱熹合併《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並且附以音訓，可見並非《四書章句集注》，詳見束景南撰〈四書集注編集與刊刻新考〉，氏撰《朱熹佚文輯考》（鹽城：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年 12 月），頁 619-620。

45 同注 8，第八冊，卷八十六〈刊四經成告先聖文〉，頁 4261。

出於隨意，以往認為《論語》代表孔子，《大學》代表曾子，恐是出於誤解，⁴⁶朱熹觀點不同於今，《大學》乃是孔氏遺書，而《論語》卻是後學綴輯孔子言論而成，所以由《大學》而入《論語》，反而符合孔子、曾子的傳授脈絡，因此《大學章句》朱熹引程氏之言云：「《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⁴⁷其實是有結構上的暗示，既然孔子是「述而不作」，《論語》自然並非孔子所作，所以代表孔子之學，其實並非《論語》而是《大學》，為求明顯，朱熹甚至以「經」來落實此一概念，「經」不僅領「傳」，其實也是四書的綱領，《朱子語類》云：

「人之為學，先讀《大學》，次讀《論語》。《大學》是箇大坯模。《大學》譬如買田契，《論語》如田畝闊狹去處，逐段子耕將去。」或曰：「亦在乎熟之而已。」曰：「然。」⁴⁸

某《論語集注》已改，公讀令《大學》十分熟了，卻取去看。《論語》、《孟子》都是《大學》中肉菜，先後淺深，參差互見。若不把《大學》做箇匡殼子，卒亦未易看得。⁴⁹

以《大學》為架構，《論語》、《孟子》是「肉菜」，是可以耕植的田地，四書是彼此承接，相互應證的關係，從朱熹與弟子的言談中，也印證此一見解。而《論語》既是後學纂輯而成，孔子形象乃是出於弟子載錄的結果，因此分別高下，釐清線索，有關孔門弟子學行的討論，自然是十分重要的課題，所以朱熹引據前賢，多所討論，甚至推求深刻，其理由也就至為明白，《朱子語類》載弟子李儒用所錄讀《論語》云：

孔門問答，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卻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⁵⁰

46 參見陳鐵凡撰〈四書章句集注考源〉言及四書第二種次第是《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符合作者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時代順序。同注 6，頁 37。

47 朱熹撰《大學章句》。同注 11，頁 3。

48 同注 5，卷十四「《大學》一」，頁 250。

49 同注 5，卷十九「《論語》一」，頁 428。

50 同注 5，卷十九「《論語》一」，頁 433。

弟子質性不同，與聞不同，既可見孔子恢宏廣大，無所不包的氣度，又可見弟子適性發展，所見不同的情況，朱熹於此之用心，自然是極富意義，也是與以往詮釋《論語》不同之處。事實上，與何晏《論語集解》相較，即可發覺朱熹對於《論語》載錄來源的推究，確實更具興趣，此亦是朱熹論究孔門弟子十分特殊之處，撮舉其要：

-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一章，引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里仁篇〉）
- ◎〈公冶長〉篇題朱注引胡氏曰：「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公冶長篇〉）
- ◎「子溫而厲」一章，朱注引程子曰：「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也，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述而篇〉）
-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一章，引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泰伯篇〉）
- ◎「子絕四」一章，引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子罕篇〉）
- ◎「大宰問於子貢」一章，引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罕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子罕篇〉）
- ◎〈鄉黨〉篇題引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鄉黨篇〉）
- ◎〈先進〉篇題引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先進篇〉）
- ◎〈憲問〉篇題引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憲問篇〉）
- ◎「子路問成人」一章，引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憲問篇〉）
- ◎「君子思不出其位」一章，朱注：「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憲問篇〉）
- ◎「君子尚勇乎」一章，引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陽貨篇〉）

- ◎「周公謂魯公曰」一章，引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微子篇》）
- ◎《子張》篇題朱注：「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子張篇》）
- ◎《大學》經後朱注：「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大學》）

由於深究孔子弟子之間學術高下的線索，朱熹對於四書經文的語境，以及纂輯的情形，也就更為留意，或是出於「子貢之徒」、或是「曾子之言」、「子路之言」、「原憲所記」等，甚至「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等，諸多說法，徵引所及，朱熹對於經文有更多的推測，脈絡甚至更及於門人與再傳弟子的關係，所謂「曾子門人」、「閔氏門人」等，於是儒學之傳，從孔子而及於門人，更從門人而及於再傳弟子，也就有諸多暗示，而孔子與弟子之間，相期於道的情形，也就有許多的著墨，所以朱熹屢屢言及「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也」、「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弟子對於孔子氣象的揣摩與觀察，孔子對門人德業的提攜與指導，於是皆成典型，《論語·顏淵篇》「樊遲問仁」一章，朱熹引尹氏曰：

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⁵¹

弟子之好學與同門之情誼，據此可見，更重要是師友之間對於道的真切追求，反覆求證，務求真確，朱熹呈現孔門篤實為學的情境，也正印證朱熹《大學章句序》「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的說法，《論語》不僅是了解孔子言行而已，更是

51 朱熹撰《論語集注》卷六《顏淵篇》。同注 11，頁 139-140。

作為檢視孔子與門人為學宏規的依據，從原本代表孔子的經典，更及於孔子門人以及再傳弟子對於儒學的繼承與發展，意義也就至為清楚。所以朱熹於前列之〈論語序說〉引程子之言，云：「《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⁵²明顯有清楚的定位作用，並非隨意引列而已，而朱熹於《論語集注》略去「聖人氣象」，改列程氏讀書之法，強調「嚴科級」的主張，也似乎有了答案。

五、結論

朱熹檢視孔門儒學之傳，分析弟子高下，從道統思惟重新檢視《論語》，《論語》不僅是了解孔子言行的典籍，更是檢視孔門儒學之傳的線索，自此形就四書義理體系，《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彼此銜接，聖聖之間，「道統」相傳，儒學有了新的思考方向，此一轉折，若非深究，常有誤解，明豐坊偽《石經大學》甚至於「正修章」添入「顏淵問仁」二十二字，嘗試補充朱熹建構孔子、曾子、子思、孟子道統之傳中失落的環節，⁵³殊不知朱熹於《論語集注》中對於顏淵學行的著力與強調，早已形塑孔門之中顏淵的學術地位，只是顏淵早亡，「道統」之傳，仍有待曾子的承繼，至於弟子之間，質性不同，高下有別，但篤實為學，同聞於道，差異之間，尤可見孔子宏闊之境界，以及「因材施教」的指引，以《論語·公冶長篇》「盍各言爾志」一章，朱注引程子云：

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

52 朱熹撰《論語集注·序說》。同注 11，頁 43。

53 豐坊於偽《石經大學》「正修章」補入「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字，乃是以《大學》屬於曾子，而孔子、曾子、子思、孟子道統之傳，卻未見顏淵之學，於是造偽添入「顏淵問仁」一段，使孔門傳道情形更為合理，見李紀祥撰《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同注 36，頁 167。

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⁵⁴

弟子各有特質，孔子適性而發，如天地長養萬物，各得其所，所以才有如天地化工的形容，聖道廣大，難以言說，如何從孔子日用之間，見其偉大，本是義理詮釋的困難所在，所謂「仰之彌高，鑽之彌深，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論語·子罕篇》）的境界，究竟如何言詮，宋儒從弟子門人而見孔門之傳，由孔子門人而見儒學內涵，角度似乎已從文字之中，更深究於傳道情境，期以掌握聖賢之間，以道相尚的學術情懷，細微之間的轉變，關乎儒學「道統」的線索。自此，揣摩其中高下，究析文外之旨，宋儒有更大的詮釋空間，至於「藥病」之說，則似乎是共期於道，執之過偏之下所衍生的結果，其緣由並非「貶抑聖門」，反而是對於聖門傳道的留意與著力，本文藉由分析朱熹徵引論列孔門弟子情形，似乎提供以往所疏忽的詮釋角度，歸納其中結論如下：

- 一、朱熹一生建構四書義理內涵，有漫長的纂輯思索過程，從《論孟精義》至《四書章句集注》，不僅是範圍的擴大，更關乎儒學之傳的再反省，以及《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理體系的完成。
- 二、聖人氣象，孔、顏樂處，原即是北宋以來儒者思索的重要課題，更是「道學」成立的重要關鍵，朱熹徵引前賢之見，從中更及於孔門弟子高下之分析，以及儒學脈絡的釐清，《論語》遂有不同以往的詮釋視野。
- 三、不同於「四科十哲」的分類概念，朱熹以孔門弟子「穎悟」與「篤實」兩分，顏淵與曾子代表孔門正宗，而曾子更關乎「道統」之傳，自此孔子門人層次井然，傳續儒學，遂有不同以往的線索。
- 四、為求凸顯聖人形象，表彰顏淵、曾子之學，朱熹更留意於孔子弟子質性不同，以及孔子「因材施教」的觀點，強調孔門弟子以道相尚，篤實為學，讓人風慕嚮往。只是「藥病」之說，過於強調弟子的缺失，詮釋一偏，不免流於刻板印象，也形成《四書章句集注》十分特殊的現象。

54 朱熹撰《論語集注》卷三〈公冶長篇〉。同注 11，頁 82-83。

五、《論語》不僅是了解孔子言行而已，更是作為檢視孔子與門人為學宏規的依據，從原本代表孔子的經典，而及於孔子門人以及再傳弟子對於儒學的繼承，朱熹對於資料來源的推究，也就更加留意，此亦是朱熹詮釋頗為特殊之處。

六、四書之中，朱熹以《大學》為「孔氏之遺書」，別立「經」、「傳」，體例十分特殊，前人或疑其偽誤，或是言其具有條理，意見兩極，莫衷一是，殊不知朱熹有意藉此彰顯儒學有傳的線索，以「經」領「傳」，以《大學》為四書綱領，自此深具進程，體系儼然。

推究聖道內容，揣摩聖人形象，本為經學詮釋的核心，朱熹關注所及，更及於孔門弟子傳道的線索，範圍更廣，義理更深，此一轉變，深具儒學發展意義。筆者分析朱熹有關孔子門人的討論，誠乃前人較少注意之處，卻又深具朱熹思索之進程，撮舉其要，不敢自是，尚祈博雅諸儒不吝指正。

附記：本文乃是整理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所發覺的特殊現象，並據以提出可能的線索，非常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之意見，提供更為宏闊的思考方向。本文為九十四學年度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之部分研究成果。計畫編號：NSC 94-2411-H-004-043，在此一併致謝。

主要參考書目

- 《大學章句》，朱熹撰，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年2月
- 《中庸章句》，朱熹撰，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年2月
- 《四書全書總目》，紀昀纂，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1971年7月，卷三十五〈四書類〉
- 《四書改錯》，毛奇齡撰，張文彬等輯，嘉慶十六年學圃重刊本
- 〈四書章句集注考源〉，陳鐵凡撰，《論孟研究論集》，收入錢穆等撰，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2年10月
- 《朱子大傳》，束景南著，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4月
- 《朱子文集》，陳俊民校編，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年2月
- 《朱子全書》，玄燁撰〈朱子全書序〉，朱傑人等主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
- 《朱子語類》，黎靖德編，臺北：文津出版社，1986年12月
-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徵引書目輯考〉，陳逢源、黃瀚儀合撰，《政大中文學報》第3期，2005年6月
- 《朱熹年譜長編》，束景南著，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
- 《朱熹佚文輯考》，束景南著，鹽城：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
- 《宋元學案》，黃宗羲撰，全祖望補修，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年9月
- 《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李紀祥撰，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年8月
- 《孟子集注》，朱熹撰，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年2月
- 《述學》，汪中撰，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10月
- 《莊子集釋》，郭慶藩集釋，臺北：世界書局新編《諸子集成》本，1983年4月
- 《欽定學堂章程》，張百熙撰，臺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
- 〈道統的建構——重論朱熹四書編次〉，陳逢源撰，《東華中文學報》第三期，2005年5月
- 《論語集注》，朱熹撰，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年2月
- 《論衡》，王充撰，臺北：世界書局新編《諸子集成》本，1983年4月
- 《韓非子集解》，王先慎撰，臺北：世界書局新編《諸子集成》本，1983年4月

Discussion on the Confucian pupils by Chu Hsi (朱熹): From the examination and summary of *The Collected Commentaries of the Four Books*

Chen, Feng-Yuan*

[Abstract]

Previous investigators have often looked into the ways people of the Sung Dynasty elicited images of the saints and derived consolation from the writings of Confucius and Yen Hui (顏回) during times of hardship. Apart from these perspectives, Chu Hsi extended his study to include investigations of the Confucian disciples. Though the disciples' excessive interpretations and readings did result in a certain bias and tendentiousness, one can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by means of their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onfucianism, and analyze their competence in re-defining Mencius, the ancient book that recorded the talks and conduct of Confucius. Since Chu Hsi, the rationale underlying *The Four Books* was formed and the *Great Learning* (大學),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論語), *Mencius* (孟子),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中庸) were first interconnected. The "Confucian orthodoxy" among the saints was passed on, giving Confucianism a new way of thought. In order to arrive at a clear picture of how Confucianism was transformed, the present paper brings together the discussions on the Confucian pupils in *The Collected Commentaries of The Four Books* (四書章句集注) and reviews the criticism which has long been related to "devaluing the saints' sect". The paper aims to examine and study how Chu Hsi classified "Perspicacity" (穎悟) and "Sincerity" (篤實) and traces how "Confucian orthodoxy" was passed on, and posits its ultimate purpose of restoring the thought of Chu His to its rightful position.

Keywords: study of Confucian writings, Confucianism, Chu Hsi, study of the Four Books, Confucian pupils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